



彼·克罗维茨科夫斯基
德·卡普斯京

中国国际主义
战士在苏维埃俄国
(国内战争时期)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Капуст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БОЙЦЫ-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Цена 40 к.

彼·克罗

德·卡普斯京

中国国际主义 战士在苏维埃俄国 (国内战争时期)

新闻工作者的搜寻：文献，回忆录，照片



新闻社出版社，1990

0503020400

© 作者彼·克罗维亚科夫斯基, 1990年

© 作者德·卡普斯金, 1990年

© 译者白金, 1990年

目 录

一、投身革命	5
李富清：我怎样来到俄国的	7
姚信诚：我要帮助革命	11
刘永安：我是怎样成为布尔什维克宣传员的	13
二、肩并肩地同俄国无产阶级在一起	16
小张和小王——“日尼亚”和“瓦尼亚”	17
列宁的私人警卫战士	21
与革命领袖的三次会见	26
三、受委托捍卫革命	36
夺取新霍皮奥尔斯克的战斗	37
他们浴血战斗	42
中国战士在乌拉尔大地上	44
四、传奇式营长包其三	51
奥尔忠尼启则，1988年	51
符拉吉高加索，1918年	52
包其三的后代	62
五、红军团长任辅臣	67
维亚火车站，1988年	67
维亚火车站，1918年	73
来自下塔吉尔的一封信	74
父亲与儿子	77
六、代跋	80

一、投身革命

同志们，在斗争中勇敢，步调一致，精神团结，以斗争为自己开辟通向自由世界的道路。

——引自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歌曲

1917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年轻共和国的第一批法令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头几项政治措施，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得到了东西方各国劳动群众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同情。

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广州政府总统孙中山，知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就致函祝贺苏维埃工农政府。俄罗斯联邦^①外交人民委员格·齐切林，在回信中以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问候了中国革命领袖并确认了他的一番话：“俄国革命同中国革命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都力求解放工人和建立基于承认俄中两个伟大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持久和平”。

俄国革命胜利后没有几个月，1918年春年轻共和国开始了经受严峻考验。反革命势力与世界资产阶级结盟挑起了反对年轻共和国的内战，开始进行旨在“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的武装干涉。年轻共和国处于敌人全线猛攻的包围圈中。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当革命处于生死关头时，当时居住在

^①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始于1917年11月的正式名称；从1922年起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编者注

俄国的数千名外国公民开始大批加入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队伍。他们在命运的支配下来到俄国。大家知道，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以前曾积极参加过1917年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它俄国城市发生的革命事件，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粉碎了反革命的阴谋诡计。

国际主义者同俄国劳动群众一起，在同白匪、武装干涉者的浴血战斗中捍卫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工农共和国。在十月革命捍卫者当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代表：南斯拉夫人、美国人、捷克人、蒙古人、匈牙利人、朝鲜人、波兰人、印度人、芬兰人、德国人、罗马尼亚人、越南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等等。国际主义者的名子永远载入了我国的史册，用它们来命名苏维埃的城市、乡村、海轮、学校等等。

在辽阔的俄国国土上，数千名国际主义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不是所有这些人的名子都为群众所知，虽然在当时烽火连天的环境下，有时无法在他们的坟墓上树立墓碑，但对他们的怀念却永远地、神圣地留在我国人民的心中。

中华民族的代表在俄国国内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那严峻的年代，在红军队伍中，在游击队中，在民警机关，在契卡^①，在对年轻共和国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劳动战线上，可以经常见到中国人。他们在沙皇制度还存在的时候就来到了俄国，定居下来。革命的激流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鼓舞了他们。

很多中国人把十月革命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并从中看到

^①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编者注

了新生活的、即将在他们祖国出现的预兆。他们同其它国家的国际主义者一起响应列宁的呼吁“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急中！”，加入了十月革命成果捍卫者的队伍。

怎么在俄国竟会有这么多中国人呢？他们这些不懂俄文、也不见得曾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外国人，怎么会那么快地弄清楚俄国专制政体被推翻后的各党的区别和各种口号的头绪呢？怎么能弄清楚并选择了唯一的途径——立在列宁一边、站在布尔什维克们一边呢？

各方面的资料表明：1917年前，在俄国有20万—50万雇佣华工。极度贫困的生活迫使他们离开故乡到异国去挣钱。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条件下的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充满了泪水的对好运气的期望是多么不可靠。

下面就是一个华工的典型经历。

李富清：我怎样来到俄国的

我于1898年出生在沈阳市。父亲做木匠活；母亲失明，软弱无力。我家很穷。我不得不给有钱人家放牲口。在我16岁那年，给我同王家姑娘订了婚。家庭人口增至8口，当然，生活更困苦，何况我家成年人当中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有时，一连好几天家里不能生火做饭，饿着肚子的孩子们直哭。我好不容易才当上了一家饭店厨师的学徒。每月挣得的那一元钱根本无济于事：要知道，杯水难熄一车之火。为了给亲人纵然是一点点帮助，我到了将军寨（现今的抚顺），给人装煤车。谁知工资跟饭店一样低呢？

1916年4月，煤矿工人传说，俄国人在沈阳招募工人，并且已有人应募并领到200卢布的安家费。一下子就是200卢布！我同我的表兄弟们一起到了设在沈阳市西城门附近庙宇中的招募所。在体格检查时，我们三人都提心吊胆，唯恐不合格，而我还担心我年纪太小，人家可能不收，给自己多加了一岁。领到的钱立即交给了亲人。

上火车前有人说，每个应募去俄国的人应领的不是200卢布，而是500卢布，于是大家就去找伴送人交涉。那个伴送人斩钉截铁地说：“其余的300卢布是做手续费和车费用的。”苦力们开始不安起来，有些人想留下来不去。但已经晚了——安家费已经领了，人已不得已了。于是我，这个刚满18岁的年轻小伙子，坐在不通风的加温车厢里，离开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故土，到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国家去……

载有3000名苦力的火车向西方驶去，好象没有个尽头似的。这样，20多天过去了。令人疲劳的长途跋涉，使很多苦力开始头发昏，人们失去了辨识方向的能力。苦力开始相互惊讶地问：“为什么坐车坐这么久？”当问及翻译时，翻译说：“俄国大得很啊！你们着什么急？又不是叫你们步行呀。”

火车终于停下了。随车的翻译（实际上是包工头）发令说：“到了，下车！”苦力们下车一看，连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这里什么工厂也没有，人也见不到，只有几座木房，无论向哪儿看，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森林。

翻译命令苦力住进已发霉了的简易住房里。

“首先为工厂采伐木材，铺设道路，”他说，“然后我们到工厂去。”

中国苦力抱着怀疑的心情着手为不存在的工厂采伐木材、铺设道路。简易住房少，容不下所有苦力，很多苦力不得不睡在帐篷里，甚至睡在露天下。吃的是黑面包和土豆。

5天后，沙皇军队突然从西方出现了，并命令中国人挖堑壕。“究竟怎么回事？”苦力们不安起来，并且，心里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原来，他们被运到靠近前线的地带，离俄军作战地幅没有多远。

沙皇军队对待苦力很残酷，只要中国人稍微有点迟延，那你就遭到鞭打或枪托的撞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决定跑回家去。但是，怎么跑呢？苦力们甚至连中国在哪个方向也不知道。不懂俄语，口袋中分文没有，这样是到不了家的。这真是就象常言所说的那样，求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让我们对这一叙述作一些补充说明吧。

沙皇政府1914年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大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被动员到前线。决定从国外，其中包括中国（顺便指出，虽然在1914年以前已有数千名中国人在俄罗斯帝国居住）招募工人来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

应募的华工在顿巴斯煤矿、乌拉尔矿井、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的伐林区、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南乌克兰的工厂里、铁路铺设线上劳动。很多中国人，象李富清那样，在离前线不远的地区筑路和修建防御工事。

通常，华工遭到当局的残酷和有损尊严的剥削。他们住在简易住房或地窖里，没有起码的生活设备、医疗救护。在官方文件中，中国人的劳动被鄙视地叫做“黄色劳动”。付给他们的钱要比俄国工人的少，尽管他们从早到晚、没有节日和休息



在革命前的俄国。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华工。

日地劳动。例如，在摩尔曼斯克铁路建筑工地上，英国人每天的收入是7—8个金卢布，俄国人—1个卢布20戈比，中国人—80个戈比。英国人的工作日为8小时，而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是10小时，10小时以上。

被弄到绝望地步的华工，不止一次地举行了罢工；在1915—1917年期间，在俄国各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居住点爆发了骚动。沙皇当局对反对压迫的人毫不客气。威胁、逮捕、在监狱和警察房里遭到毒刑拷打——这些就是惩罚本国“暴动者”和外国人的办法。著名的中国国际主义者、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回忆说，他母亲为了使丈夫获释而到有关单位磨了很久。她丈夫是由于参加罢工而被关进叶卡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旧称）监狱里去的。谁知道，这

些“监狱大学”成了多少中国人认识到革命斗争的推动力？

此外，重要的是，尽管在劳动报酬和生活条件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待遇，但中国苦力不能不看到，同自己并肩劳动的俄国工人和农民同样地处于贫困和不幸，也就象他自己那样。下面还有一个目睹者的证词。

姚信诚：我要帮助革命

毫无意义的、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劳动群众的处境越来越坏。很多俄国农民被赶赴前线，因此大片土地荒芜。日益尖锐地感到食品方面的不足。与此同时，资本家越来越厉害地敲诈勒索工人。

我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资本家到处都一样，俄国资本家一点儿也不比中国的好。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不幸事故，老板毫不同情工伤者的命运，不仅如此，工伤者还有可能被立即遣往俄国境外。总之，我们的命运根本没有保障。

但是，普通俄国人的生活也不比我们的好。我们在卡里诺（在乌拉尔）工作期间亲眼看到，怎样强迫郊外农村的很多农民去当兵和怎样把他们运往前线。父母亲为自己的儿子送行，妻子为丈夫、小孩儿为哥哥、姑娘为未婚夫、小伙子为朋友送行。并且，他们都痛哭不已。

有一次，我成了往前线送行时的悲惨情景的见证者。应募去当兵的人与为他们送行的亲人恋恋不舍，相抱不放。列车开动的临近了。当列车已应开动时，很多送行者站在火车头前的轨道上。他们号啕痛哭，大声喊叫。那时，从车站房内出

来了一队警察，他们开始粗暴地把站在轨道上的送行者往外推，用短皮鞭毒打他们。但是，一些比较任性的索性躺在铁轨上，宁死不离。不可想象的吵嚷开始了。那时，车站站长出来了。他摆着傲慢、了不起的架子走到了站台前，站到火车头旁并挥动了小旗子，给司机发出了开车的信号。火车头鸣了一声，列车开动了。在这一刹那间听到了令人心碎的肠断的喊叫声：两个妇女被撞倒，而且伤势严重。这种情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引起了我的愤怒。

当我回到自己的简易住房时，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同志们。他们不安起来，开始激烈地讨论已发生的事件。正是那时我暗想：如果将来在俄国真的爆发革命，那我定会给它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1917年到了。在二月或三月间，有次在卡里诺车站出现了一群游行示威者。一些人手中拿着斧头、镰刀、草叉以及粗棍子；另外一些人打着标语。标语上写着：“打倒专制政体！”，“给人民自由和面包！”，“打倒富农恶霸！”这次游行示威重新激发了我参加革命的愿望。但那时，关于人民的巨大力量，我还不知道。我想，用这样极简单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游行示威者会被沙皇军队一举镇压下去和驱散的。我很担心这些人的命运。

姚信诚（顺便指出，他后来成了红军战士），其他曾给我们留下回忆录的、原先的中国苦力，很亲切地评价了那时俄国的“特种”人。这是俄国革命者：工人、知识分子、出身于其它社会阶层的人。就象中国国际主义者所回忆的那样，正是革命者特别关心他们，支持并保护他们，能帮助什么就帮助什么。从他们的口中，很多华工了解到“革命”这个词，听到了列宁的名字。

与1917年推翻沙皇后执政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同，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不只是口头上关心平民。无论你是俄国人还是为环境所迫而来到俄国的外国人，无论你的皮肤是哪种颜色，无论你用哪种语言说话，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种植庄稼，在机床旁工作，冶炼金属，建造房屋，铺设道路。你是劳动者！并且，除你本人外，任何人都不应有权为己攫取他的成果。

布尔什维克这样肯定地说了。他们为此进行了斗争。

1917年5月（大约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半年前）在彼尔姆举行的第一次乌拉尔州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审核了“输入劳动”这一问题，并建议所有苏维埃就地重审同华工签订的合同，取消奴役性劳动条件并吸收他们加入工会。

被运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华工的伙食和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工资得以提高、体罚被严禁，这都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索洛维约夫、巴甫洛夫、斯莫尔扬尼诺夫的努力争得的。因此在阿拉帕耶夫斯克组建了以上面已经提到的任辅臣为首的部队，并非偶然。这是在乌拉尔最早组建的中国部队之一。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的以后篇章中还将谈到。

相类似的情况曾在俄国其它地区、城市发生过。

每个正直的人都准备为真理和公正而斗争。难道为此还值得对列宁的志同道合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感到惊奇吗？

相信了他们。跟随着他们走了。

刘永安：我是怎样成为布尔什维克宣传员的

我于1913年来到了沙皇俄国。同旧中国一样，俄国也不是穷人的天堂。只是我年富力强而且任性，就象故事中所说的那

个蠢人一样，一心追求幸福。尝尽了不少苦头。敲了数百家的门，为的是找上个工作。直到最后才在一家面包房里找到了。在工作中人们很快地相识并相互理解。在这里马上就会知道谁是什么人。一年后，我已有了很多俄国同志，但最亲近的要算是瓦西里和米哈伊尔。他们俩都是布尔什维克，是这家面包房工人的领导者。

有一次（这是1917年秋天的事）完工后，瓦西里把我领到一旁说：

“明天我们动身去农村和矿上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那时俄语说得不好（只能说几句一般的），瓦西里所说的，我也没全懂，但心里清楚：如果同好人一起走，那到处等待你的是阳光。我决定同他们一起去。

瓦西里、米哈伊尔和我，三人一道去农村，走过一村又一村，整天整天地走。在村里开会，在贫农家交谈。瓦西里口齿伶俐，会说话，不仅能使人信服，而且能感人肺腑。人同他一谈话，就开始尊敬他。米哈伊尔比较年轻，多半在年轻农民当中做工作。他会说，唱得也不坏。我的责任是，使我们在开会时免遭敌人的攻击，料理我们三人的住宿和伙食这些事。

在同人们交谈时，瓦西里说，全世界的贫农将怎样起来革命，而我乘机加进一两句：“中国人民的生活也象俄国人的——样艰苦，我们也起来革命”。这样，我参加了宣传工作。哎哟，在那些年代，做这种工作是多么危险呀！……

1917年11月，我们来到了矿上。在那里，瓦西里和米哈伊

尔的工作就更多了：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开会、聚会，会上解释党的政策，而白天人们则川流不息地来找他们谈心。

关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和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这一消息，我们是在两个星期后才知道的。局势很紧张：工人捣毁了事务所，赶走了资本家；农民夺取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而资本家、地主及富农则疯狂地进行报复。我们的工作多得很。

有一次清晨，瓦西里满身是霜地跑来对我说：

“小刘，我们组织自愿革命队，你也参加呀！”

这还用说吗！

“打资本家，”我说，“我永远高兴。”

三个人——三个故事……总的来说是一般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大概很多旅俄华工还记得起这样的经历。名字、地名、细节，可能不同。难道说问题在于它们吗？李富清、姚信诚、刘永安和他们的同胞亲身所处的事件发展进程，对所有人来说大致是一样的。它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起义旗帜下引导中国人民的儿子。从无权的苦力变成自觉的历史创造者，当然不是突然的，不是一下子，但它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是否想到：多么异乎寻常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这些为改造世界社会这一宿愿所鼓舞的人们呢？这一崇高的目标要求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呢？

最初的几次战斗临近了……